



好 读 书 读 好 书

蔡澜：人生有味，何必太深刻

□ 赵祺妹



青岛出版社
蔡澜著
「寻味世界」系列



近日，香港文化名人、作家蔡澜先生做客青岛，推介新书“寻味世界”系列、在大学演讲、办书法展，忙得不亦乐乎。

以“食神”闻名的蔡澜，赶上了消费主义的浪潮。多年来，他笔耕不辍，其文多短小精悍，妙语频出，深得明清小品文精髓，始终以“真”为生命真谛，行文如此，做人如此，倪匡评价蔡澜的处世之道是“看世人不论青白眼，不计较利害得失，只求心中真喜欢”，金庸更是称蔡澜为“一个真正潇洒的人”。在一些场合，蔡澜不讳言自己逃避的“大”，也不否认追求的“小”。在他眼里，既然世界已经这样，不如退而好好享受，如他一本书名所说“看得开，放得下，才是人生”。

才子“食神”

香港有“四大才子”之说，四人的标签分别是“写武侠的金庸”“写科幻的倪匡”“写歌词的黄霏”和“写美食的蔡澜”。如今，黄霏已驾鹤西去，金庸、倪匡鲜少露面，唯独77岁的“食神”蔡澜还在满世界活跃着，他成了世界华人健康饮食协会荣誉主席、美食纪录片《舌尖上的中国》的特约节目总顾问。对此，他淡淡评价：“我只是全球各地跑得多，吃得各国美食多，自然有了审美鉴赏力。”

“食神”称号给蔡澜带来名望和地位，也为他在我们这个“民以食为天”的国度赢得了更高的知名度和话语权。九龙街市上，走两步就能看到贴着

蔡澜合影的商铺。蔡澜对这些老街坊的合影要求都有求必应，为了让大家分辨出哪些是真正的美食，他放出话：“在合影里，但凡我嘴角露出微笑，就是权威认证。如果我冷漠无情，就代表我是迫于无奈。”

鲜为人知的是，在成为“食神”之前，蔡澜还做了四十年的电影。电影监制并不是一个轻松的活，何时开拍、何时杀青、进度如何、后勤保障……几乎囊括一部电影中所有繁杂的事项。就是在这么一个陀螺般连轴转的职业生涯里，蔡澜愣是把“及时行乐”四个字演绎到了极致：在澳洲拍片时，蔡澜跑去酒厂参观研究，品味不同木桶酿出

的酒的不同风味；在韩国拍片时，听说某个地方的桑拿不错，就呼朋唤友去洗桑拿，体会不同的按摩手法。在拍戏时，遇见冯康侯、丁雄泉等艺术家，就向他们学习绘画、篆刻……

“我一段时间一定要做好几件事，从来没有只做过一件事。我做电影的时候开始学书法。这是我母亲教的，人要多一点求生本领，一件事你做到不想做了，就可以做别的。求生本领越高，你的自信心越强。因为人总是怕又老、又穷、又病，但是你有许多求生本领的话你不怕的。”

那些看起来没用的兴趣爱好，最后都成为蔡澜生存的能力。

文字江湖

四十岁那年，当电影监制的蔡澜突发奇想，想在金庸创办的《明报》写专栏。要知道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《明报》大咖云集，作者间有一句很流行的话：“不在《明报》写专栏，就没有江湖地位。”当时能在《明报》写专栏可谓难于登天，好在蔡澜认识倪匡，并与倪匡定下一条“奸计”。此后倪匡每次和金庸吃饭，就大谈蔡澜。起初金庸没插嘴，后来终于忍不住问：“蔡澜是谁？”倪匡吊了金庸三天胃口，才约了蔡澜。金庸盛装赴会，三人欣然落座，天南地北畅谈。忽然间，金庸推了推眼镜，轻声说：“我想请蔡先生替《明报》写点东西，不知道蔡先生有没有时间？”

从此，蔡澜在《明报》副刊开了一个名叫“草草不工”的长期专栏。“草草不工”四个字是他的自谦，形容潦草与

马虎。但实际上，蔡澜对于写作有着锱铢必较的严谨。蔡澜的小文在结构上像欧·亨利，喜欢在结尾处反转。在语言风格上，他坚持用现代标准汉语写作，平白直叙。文章整体沿袭他中意的明朝小品文，新颖的结构让他的专栏在杂文盛行的《明报》副刊中脱颖而出；现代标准汉语虽不像粤语那样词句生动，却能囊括所有华人的认知；短小精悍，给读者意犹未尽的阅读体验，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。

那段时间，倪匡写“科学幻想小说”，黄霏写“随缘录”，金庸写“飞雪连天射白鹿，笑书神侠倚碧鸳”，蔡澜写“踏歌江湖行，美食尽囊中”。风起云涌，字底江湖，这无疑是在《明报》最辉煌、最值得骄傲的时期。

蔡澜写的好友，金庸、黄霏、倪匡、亦舒、黄永玉、古龙、张彻、胡金铨、蔡

志忠……皆是令人神往的一代风云人物。他笔下的金庸调皮得像个“老小孩”：数年前，经过一场与病魔的大决斗之后，医生不许查大侠吃甜的。但是愈禁止愈想吃，金庸把一条长巧克力藏在女护士的围裙袋里，又放了另一条在自己睡衣口袋中，露出一截。查太太发现后，把他睡衣口袋中的巧克力没收了，金庸则把护士围裙袋里的拿出来偷吃。

对此，蔡澜评价道：“不然，他小说中的稀奇古怪事又怎么想出来的呢？”

三十多年的时间，蔡澜写了两百多本书，如此多产，却不敷衍，一篇几百字的文章也要反复修改四五遍。他不停地阅读、去别的地方旅行，让自己不断吸收新东西，才能写出高质量的文章。

做好一个人

朋友问：“你到底是什么身份？电影人？食家？茶商？开餐厅的？开杂货店的？做零食的？卖柴米油盐酱的？你最想别人怎么看你？”

蔡澜答：“我只想做好一个人。”

蔡澜坦言嫉恶如仇的年轻时代已成过去，现在只是尽量能说要说的话，不卑不亢，“最大的缺点是已经变成了老顽固，但已经练成百毒不侵之身，别人的批评，当耳边风矣”。

在消费主义盛行的当下，蔡澜的“享乐主义”人生观受到有些人的追捧，而在传统文化人眼里，蔡澜的处世之道无疑是不可取的，或者至少说是不值得推崇的。访谈纪录片《十三邀》里，许知远飞到香港对话蔡澜，多次问蔡澜“读圣贤书，所为何事”，总

想挖出点“享乐主义背后的感伤”。许知远无法理解：蔡澜的家世、文脉、学识都赋予了他一种“文化人”追求的却是喜怒哀乐顺其自然，得失不萦于怀，活得通透明白；吃遍美食，游历全球……这样活着，真的能心安吗？

蔡澜的回答既洒脱又无奈：“我认为我要是一个人可以改变的话，我就去洒热血断头颅，我认为我没有这个力量，我一个人改变不了，所以我就开始逃避，吃吃喝喝也是一种逃避嘛。”

许知远追问：人是平衡的，有快乐的、享乐主义的一面，就必然有感伤的一面，不然后人就会失衡。蔡澜用一个简单的比喻回答说，自己是一个把快乐带给别人的人，所以有什么感伤，尽量都把它们锁在保险箱里，还用大锁链锁着，最后一脚踢到海底。这话似乎给了许知远一点安慰，“你还是知道有这

个保险箱的”。

“我知道所以我可以踢嘛。”蔡澜继续喝酒。

金庸曾评价蔡澜见识广博，懂得很多，人情通达而善于为人着想，于电影、诗词、书法、金石、饮食之道，更可说是第一流的通达。这样一个“一流通达”的人，总不会连一个横梁四句都参不透。

正因如此，他才转而选择通过“活出自己活的样子”去补偿真实的现实的痛苦。蔡澜有本书名叫《看得开，放得下，才是人生》，这种“凡事都能看得开、放下”的人生信条像一只巨大的胃，没有什么能够比它更有效地消化不安。对他来说，既然世界已经这样，也许根本没有更好，那么活着，大吃大喝也是对生命的一种尊重。他的作品，能让人有所感悟，那就是体会人生之美、生活之趣。